

[返回首页](#)

悔悟与反思——苏联解体亲历者对改革历程的新认识

作者:

2010-6-3 9:04:00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葛新生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以苏联国家解体而告终，8年的叶利钦改革是以1998年的金融危机作为标志。一句话，都不成功。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是如何认识、评价和反省的呢？

本世纪初，在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不久，一本著名的法国评论杂志《批评》，出版了一期莫斯科特辑，对俄罗斯的改革进行了评论。杂志中的文章大多为俄罗斯学者所撰写。编者按中这样写到：“从前有一个苏联，不管是受奉承还是遭痛恨，那时，它是重要的。现在有一个俄国：有人在意吗？——俄国今天已经降低到像是一幅只不过有两三个特点的图画，钉在一面不显眼的墙上。”美国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对此发表评论说：“有两件事情对所有的人都变得清楚了。俄国不会在财富和经济力量上‘赶上’西欧，不但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它可能会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不存在脱颖而出的前景。它命定要在很长时期内是一个半边缘国家。”

很多俄罗斯国内的学者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状况的认识与身处西方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曾经对苏联时期的党和政府都进行过尖锐批判的麦德维捷夫教授，面对解体后迅速衰退的俄罗斯现实无奈地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在麦德维捷夫教授看来，俄罗斯的这种变化，源头在戈尔巴乔夫那里。

前不久，戈尔巴乔夫在分别接受中国光明日报记者和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采访时，真实地表达了他面对俄罗斯现实所做出的悔悟。在谈到苏联的改革时，戈尔巴乔夫认为问题出在仓促上马和操之过急。当香港记者问他，在苏联主政的6年间，自己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时，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最大错误在于，太晚开始改革及重建苏联共产党。因为反对改革的声音，一开始就来自党内，因此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压力。共产党在苏联是独占政权的力量，进而成为国家的代称。我实施的直接开放步伐实在太快了，无论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民主方面。权力分散是必须的，但步伐太快，人民、社会无法跟上。在苏联有官僚体制的存在，推行民主改革所必需的步伐需要调整，因为有许多来自官僚体制的阻碍。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党内的机制失去控制，他们趁机各自营私，那是最大的错误。”

在同光明日报记者谈话时，戈氏更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这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完全正确。”在提到“民主化”时，他说：“曾经有中国记者问我，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民主化方式应用在中国。我回答说，你们要持续改革，你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国家，你们应该很有自信，你们的人民很聪明，我不认为我应该给你们改革的建议”。“俄中都面临克服贫困问题。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看出，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他的“新思维”所鼓吹的“西方民主”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不得不承认西方的那一套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在苏联和俄罗斯是行不通的。

早在戈尔巴乔夫此番言论之前麦德维捷夫和雅科夫列夫就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初期所倡导的“民主化”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认识。麦德维捷夫在2003年出版的《苏联的最后一年》中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年~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甚至从来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社会至少要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麦德维捷夫认为：“80年代末在苏联兴起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自由谈论民族问题和成立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可能。——与民族主义随之而产生的还有分立主义。”“改革思想和设计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政治意志的丧失，以及国家和苏共中央政权的瘫痪助长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势头，随着苏联经济的状况的不断恶化，产生了这样的幻想，认为只要从莫斯科独立出来，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定富足。”“对于苏联的统一来说，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更加危险。”正是俄罗斯分立主义者布尔布利司斯提出的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的想法，并最终将其写入别洛韦日协议中。因此对苏联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雅科夫列夫，曾经担任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俄罗斯叶利钦改革的策划者、参与者。作为推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革新派成员，他对在苏联和俄罗斯搞民主化的体验是真实的和深刻的。他认为，简单地导入不适合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了诸如官僚主义盛行、国力下降等一系列恶果。他在一本书中写到：“我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唉，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变成官僚主义民主制。——我坦率地说，我没有料到议会制会给民主制带来危险，不管这是多么不合情理。我原来认为，自由的差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权利机构。可是，现实的生活情况是，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地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

叶利钦在1999年12月31日的辞职演说中承认：“我自己也曾经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艰难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这些话可以看做是他对自己执政8年的反思。他认识到企图通过“休克疗法”这样的办法“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想法遭到了失败。

对解体前苏联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革的现状，雅科夫列夫用下面的一段话讲出了自己的认识和担心，他说：“今天俄罗斯，有很多的事情使我们所有的人感到忧心忡忡——只要我们走入歧途，这对我国人民将是悲剧，对高度相互依存，可是还没有认清自身的统一性和还没有对世界生活的全球化作好准备的整个世界也将是悲剧。”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对“公开性”的认识更有独到之处，在他看来，“公开性”是一柄利剑、一柄双刃剑，使用时必须审慎地审时度势，切记要慎之又慎，否则会伤害舞剑之人，无异于自刎。他在《大动荡十年》一书中写到：“公开性作为民主的一个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特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行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如改革和改革后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开性的工具，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公开性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切除社会肌体上僵化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给新的健康的部分以发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就会变成一根大棒，对周围的一切，不论好坏，不分先进落后，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公开性可以是氧气，也可以变成毒化人的理智和毒化社会意识的一氧化碳。

前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指出了“公开性”失控所导致的后果，他说：“公开性使人感到兴奋，可以大声说出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话，可以指责任何人……没过多久，人们几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方的有关专家都感到吃惊。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充分的条件，党放开手脚搞无限的公开性，无限制地批评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在戈尔巴乔夫做出悔悟之前，不少苏联时期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已经先后进行过反思。这些人在对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变化后，难以接受这一他们曾为之呐喊、奋斗的结局。曾因持不同政见而定居巴黎的马克西莫夫，面对祖国的现状也发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这些经过深思后的肺腑之言，显得比戈尔巴乔夫的认识更坦率也更直白。

除了上述俄罗斯亲历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做出悔悟的表现之外，其他一些国家的当事人也在不同的程度表达了自己对改革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据克拉夫丘克披露，苏联解体后担任白俄罗斯第一届总统，也即现任总统的卢卡申科曾经说过，应该把那3位亲手扼杀苏联的人送进监狱。

亲自签订“别洛韦日协议”的3位政治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立场和态度，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悔悟之意。例如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14年的纪念日，回答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几个敏感问题时，就表现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意。按照原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的话说，他“现在宁愿切断自己的手臂，也不会再在别洛韦日协议上签字”。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两个问题分别是：时隔14年之后，您今天是否还会同意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您当时是否预见到十四年后的今天国家的面貌？

克拉夫丘克如是说：如果今天还让我签署宣布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的话，我会坚持在这一协议中加上这样的内容，那就是保留独联体共同市场；建立一种过渡时期的货币，例如：卢布。我还会说服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按照欧盟的模式来组建独立国家联合体，我没有想到国家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是根据国家的发展需要，而是根据每一个总统的个人好恶。我们几个相互为邻上千年的国家，不能按缺乏理性的行政决策来相处。

由于《莫斯科共青团报》记者无法联系到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因此只能让时任俄罗斯联邦国务秘书并亲自参与这一事件的布尔布利斯，代为回答了问题。布尔布利斯以一些“莫须有的灾难”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对于现在的结局承认自己和叶利钦没有足够的智慧。他说：我们当时防止了更大灾难的发生。在1991年12月8日之前，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实际上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苏联的崩溃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请大家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吧。周边发生了如此之剧烈的动乱，苏姆盖依特事件、维尔纽斯事件、第比利斯事件……当时我们只能通过这一下协议来防止内战的全面爆发。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样子。在签署的别洛维日协议中，我们确实设想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间发展模式。我们当时作为俄罗斯的领导人，确实没有足够的智慧来与独联体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国详细拟定一个可以立足于10至15年的关系发展战略。其实，在当前原苏联国土上，做出这种对比和反省的决不仅限于这几位前国家领导人和学者。从俄政府决定恢复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为俄罗斯国歌，普京总统下令重新恢复“斯大林格勒”，俄高层领导提出要将苏联时代的红五星作为俄军军旗图案和军徽图案等一系列变化中，可以看出，这些现任官员确实无法以胜利者自居，不得不承认苏联国家的实力、势力与地位是现如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不管怎样，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曾为苏联失败的改革呐喊助威的人能够认真反思，总结改革的失误与教训，重新探索振兴之路，应是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其他国家未来的希望。

京ICP证 号 服务电话：010-85196461；010-85196462 Email:gjbjb@cass.org.cn

合作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网所截文章、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务必核实，风险自负。